

黄奇帆谈西部大开发

——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问

曹景行:您从重庆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开发走到这一步有多少成就?是不是只是讲得多,实际的东西见得少?今后发展下去又会怎么样?我们说,如果中国国务院新班子建立五年,这五年中,西部开发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黄奇帆: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回答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中国在四五年前提出了西部开发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一种宣传,还是像二十年前深圳、广东特区开发一样,货真价实地经济推动?像上海1990年浦东开发一样货真价实地推动?我认为,现在中国对西部开发的推动一点不亚于二十年前的特区开发,一点不亚于十年前的浦东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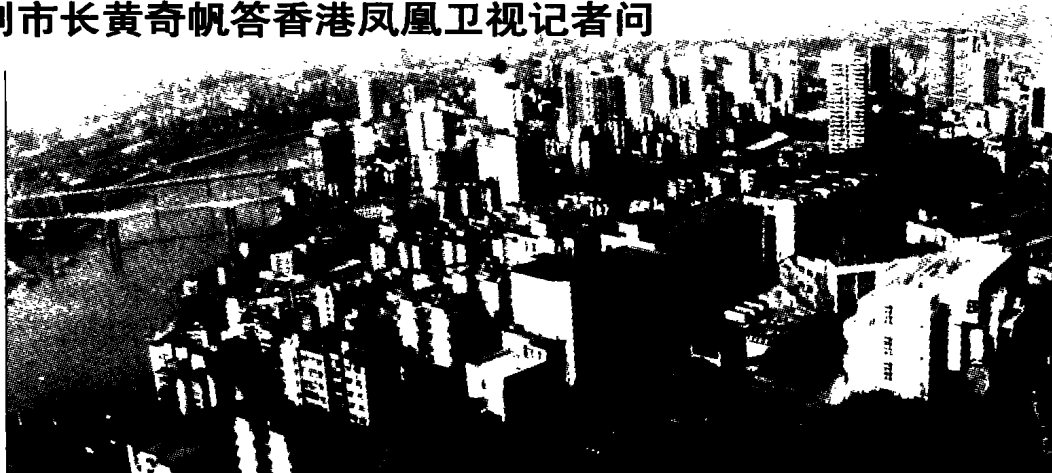
中国政府的西部开发从三个角度在努力推进。一个是国家级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许多重大项目放到了西部,比如西部的铁路,青藏铁路,其他各个省市之间的铁路,铁路投资大规模地提升。

第二个方面,对西部的省市财力支持、扶持,我认为比当年特区开发的时候的财力支持还要大,比十年前浦东开发的时候财力支持还要大。因为我在浦东开发作过负责人,对特区的政策、财力体制,对浦东的财力体制比较了解,当时最重要的财力体制,就是特区、开发区新增的税收留在这个地方,中央不拿走,全留下,西部开发不仅仅不拿走新增收入,而且把东部的收入转移支付一块到西部,把每年发行的国债投入一块到西部,这样就使西部现在得到的财政支持大大超过二十年前的特区开发,十年前的浦东开发。

第三个,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招商引资方面,我认为现在跟二十年前特区,跟十年前的浦东政策一模一样,完全到位。

曹景行:刚才讲到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一个新的直辖市,重庆有一个大的农村,应该说整体的发展水平不是很高的,又有一个三峡的库区问题,这些因素加起来,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在中国很独特,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城市直辖对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黄奇帆:重庆当初建直辖市的原因有三条。第一,重庆在历史上,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四次中央政府直辖,在西部一个地方有过四次中央政府直辖的就



是重庆,为什么成都不直辖,别的地方不直辖,而重庆直辖?这有它历史的原因。

第二,三峡库区百万移民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需要把重庆列为直辖市,建一个省级政府来推进。

第三,大家说,建一个重庆省也可以加强三峡库区移民管理,为什么要弄直辖市?我想第三个原因就是西部开发。重庆直辖是1997、1998年,也是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开发的时候,作为西部开发来说,不能够几百个县同步开发,总是有重庆、西安、成都、贵阳、昆明这些重要的城市群的发展,然后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城市群也需要有一个中心城市,重庆直辖了以后,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由于中心城市带动周围的城市群,最后由城市群带动整个区域发展,区域开发。

这实际上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成功的开发道路。你看整个中国十万亿GDP,80%是几百个城市产生的,20%是农村产生的,经济资源比较多的集中在城里。也就是说,经济要素、经济资源在市长手中控制着。但是行政资源,比如要改变一些游戏规则,一般要省委、省政府来确定的,所以行政资源在省政府。省长如果跟老外谈判,说要卖块地给老外,他不能卖,他要通过市政府,因为市政府管这个土地。但是市政府如果要改变地价,改变游戏规则,要经过省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是两张皮,当然上下级有个一体化协调,但对重庆来说,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为一身,是一体化,所以这个管理体制也是很特殊的。在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上海有没有?好象有,但是上海就管直辖市的六千平方公里,他没有大农村的构架、指挥出去的情况,所以

重庆这个体制我觉得很有他的特点,是中国几十个省里面很特殊的一个体制。

曹景行:西部像重庆这样的体制,以及西部其他地区的开发,到底和东部,比如和上海怎么建立一种比较有机的互动关系,往往是现在分开来看,有的担心东部的发展快了,还是西部的落后,或者因为现在资金倾斜了,这个当中到底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比较对双方都有利的有机的一种结合?

黄奇帆:我觉得中国的东部经二十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的体系。东部的发展也使整个市场体系日益成熟。但是,东部的发展由于到了一定阶段,区域内部的市场会逐渐饱和,或者逐渐地到了一定的高度,增长的后劲会放慢。西部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的市场跑马传递,先入为主可以有更多的利润空间,有战略眼光的东部集团,现在应该率先到西部来,这就像九十年代初率先跑到上海的那些香港集团,或者欧美的集团现在是比较发财的,但现在再跑到上海去的,买地成本高,做什么事成本都高,从这个意义上讲,眼光可以放到西部来,中国东、西部之间在资源配置上有很强的互补性。

曹景行:现在这种关系,因为一种是行政,还有一种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本身能够把东部的资金或者企业吸引到西部来吗?

黄奇帆:现在如果靠行政来推进西部开发,我认为不大可能,意义也不大,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市场一体化了,WTO也进入了,整个中国同等国民待遇对老外、内资、外资,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运作,从这个角度讲,哪个地方有市场空间,有钱好赚,



曹景行:刚才黄奇帆谈的是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问题,农村发展的问题。本来,一个直辖市农村问题并不太突出,但是重庆恰恰就有它的特点,不同于其他的直辖市,它有一个大农村。重庆除了一个重庆市以外,有一个相当大的农村人口和农村空间。黄奇帆认为这对重庆今后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有利因素的,也就是说和其他直辖市相比,这么一个大农村为今后重庆的扩展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是重庆特有的优势。但是要实现这个优势,一定要把“三农”问题解决。所以,在重庆的发展中,他是把“三农”问题放在一起考虑的,而这个当中就是怎么样把农村人口逐步转化到城市来,然后使农村变成城市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独特考虑的地方。

董嘉耀:我们继续来看看黄奇帆的专访,他还给我们算了一笔解决农村问题的经济帐。

曹景行:刚才除了那个行政体制,还有一种,重庆是现在有个大农村,大农村到底是包袱还是一个空间?刚才从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感觉到不止是一个包袱。但是,反过来是对农村问题的突破,因为重庆八万平方公里的农村不是什么富裕的农村,不像上海郊区那么富裕的,它本身是一个可以代表西部农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探索代表一个中西部农村怎么样走向现代化这方面的经验?

黄奇帆:重庆最大的特点就是广袤的土壤,有非常大的农村,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作为一个直辖市,既然是一个城市化的推进,那么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就比一般省区要求会更高一点。上海、北京这样的直辖市,城市化率都已经达到了90%以上,他们对城市化率的要求已经没有了,因为已经达到更高的水平了。但是作为重庆来说,现在的城市化率去年达到36.4%。作为一个直辖市,重庆这样的直辖市不能去提80%、90%,但是无论如何,比如十年以后能够达到50%是应该的,所以直辖市会使得重庆城市化率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率增高。

我们的目标是想通过每年大体上平均提高1.5%,每年有五十万人口从农民转为市民,这么一个过程,十年之后有500万人转为市民,像现在一千万城市人口,十年以后大体上是一千五百万城市人口,就是这么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不能够违背经济规律的,不能硬干,否则就是拔苗助长。

具体地运作来说,首先是一个投入的过程。比如说一个农民进城,一个城市居

民每个人在城里需要一百平方米的土地,就是一个城市居民一般需要占有一百平方米的城镇化土地,包括道路或者绿化、或者住房、医院、商店、工厂,所有城市化的土地大体上人均一百平方米,在香港也是这样,五百万人就要五百平方公里,一个城市化的土地一平方公里一般要投入十个亿左右,五百平方公里的扩张就意味着五千亿的投入。所以城市化率的提高不是简单的一个行政的转化。如果说重庆有五百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就意味着五百平方公里的城区扩张,就意味着五千亿的投入。所以,当一个政府在推进这样的过程中,他应该清晰地理解这个背后的经济责任和经济任务的繁重。

城镇化的推进对于我们重庆农民的“三农”问题最终解决脱贫有重大意义。只要分析一下现状,重庆三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二千万农民只占有重庆的15%的GDP,而一千万人占有85%的GDP,这就意味着农村的贫穷。因为这种比例即使再过十年也不可能使农村的GDP比例从15%变成30%。也许再过十年农村的农业GDP只占12%,如果农民的人口不减少的话,那么农民的收入永远不会提高,只会相对贫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战略上减少农民,增加城市化率,让城市化率的水平提高到比工业化水平更高的地步。

现在我们工业比重一般是40%多,但是城市化率是30%,如果我们城市化率达到50%,或者60%,而工业水平是40%多,这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

在这个问题上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提高城市化率。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中国的农民收入有一个基本的数据上的案例,大体上如果是年均收入一千元以下的农民,90%的收入是来自于农业收入;两千元收入的农民,40%的收入是非农收入,60%来自于农业;到了三千元的时候,就是60%非农收入,40%农业收入;到五千元以上,一定是90%的非农收入。

意思就是说,农民如果有更多的非农收入,农民才能真正摆脱困境,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农收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们推动城镇化也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农民的活动方式调整的一个过程。总的来说,我觉得重庆这个直辖市对解决“三农”问题战略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重庆把城市化率的提高摆到更高的位置上,城镇化进程应该比一般的城区构架还要加快,但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去加快,而不是拔苗助长。■

资本的力量就往哪走,只要这个市场空间是确切的,资金就一定会过来,你不过来他会过来。沿海的企业从资本的需求出发,看到西部有市场,就到西部来投资。老板跑到西部来投资,为老板打工的人才就一窝蜂都会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万商云集的地方,一定人才云集,用不着担心这个人才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是怎么一个循环过来的,这个是一定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更注重的是万商云集,万商云集本身就会人才云集,这是一个大的概念,所以总体上就比较宽容,人才来去自由,这是一个总概念,但是这么一个总概念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人才,或者对人才来去听之任之,我们还是很注重培养本地人才,善待本地人才的。

董嘉耀:曹先生,因为黄奇帆以前在上海工作过,他觉得现在西部的政策有上海当年甚至有超越上海的感觉?

曹景行:黄奇帆是很典型的素质化管理的官员,而且他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影响。他在具体的工作中,实际上还在探索中国发展规律的问题,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比如他刚才讲到重庆,他把重庆看作一个小的省,而这个省又少了一个层次的行政管理,这样就节约了行政开支,这对行政区的管理方面来说,他觉得是有他特殊的一种优势。像这种考虑我觉得都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还有就是他从重庆的角度还谈到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特别是关于当前“三农”问题怎么解决的一些问题,这又是一种带有某种探索规律的性质。

董嘉耀:曹先生,我们知道重庆是中国新近建立的第四个直辖市,它有一些特点。